

新中国 70 年民营经济发展： 演变历程、启示及展望

陈 东^{1,2}, 刘志彪²

(1.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2. 南京大学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民营经济总体上呈现“U”型发展轨迹, 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70年里, 民营经济经历了1949-1952年的恢复生产阶段、1953-1977年的社会改造阶段、1978-1991年的改革发展阶段、1992-2002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2-2012年的科学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主要有: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解放思想是必要前提;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不竭力量; 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是决定因素;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内生动力。从新时期到新时代, 中国民营经济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中国经济; 民营经济; 经济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411(2020)02-0083-12

Privat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70 Years of New China: Evolution, Enlightenment and Prospect

CHEN Dong^{1,2}, LIU Zhi-biao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2. Yangtze IDE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private economy has shown a "U"-shaped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n the whole,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70 years, private economy has went through the restoration of production from 1949 to 1952, the stag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1953 to 1977, the stag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rom 1978 to 1991,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from 1992 to 2002, the stag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rom 2002 to 2012, and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2012 to the present. The enlighten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s private economy include: insisting 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emancipating the mind a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respecting the masses' pioneering spirit as an inexhaustible force,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promoting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hip as an endogenous motiv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a's private economy must practic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ness, openness, and shar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china economy; private economy; featur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C0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18YJC790009); 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SK2018ZD003);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808085MG211)

[作者简介] 陈 东(1978-), 男, 江苏南京人,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后在站,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是民营经济、产业经济; 刘志彪(1959-), 男, 江苏丹阳人,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全球价值链。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吴跃农理事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此表示感谢。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从弱到强,已成长为世界超大规模经济体。这其中,民营经济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1]。本文所指的民营经济,指改革开放前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各种私人经济,和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黄孟复,2010)^[2]。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民营经济的相关概念,1939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毛泽东,1991)^[3]。在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党始终高度重视,并把这一政策上升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战略高度。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要求我军“‘进入城镇以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摇摆不定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从而为党在政治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顺利完成革命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准备了重要条件(沈云锁、潘强恩,2011)^{[4]275,276}。新中国成立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并积极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而肩负公私合营、融入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坚持并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展(胡迟,2018)^[5],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大大改善,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健康成长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在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旗帜鲜明提出三个“没有改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习近平,2018)^[6]。坚定和鼓舞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和创新热情。

近年来,学术界对民营经济展开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多角度评述,“两个毫不动摇”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卫兴华、谭璇,2018)^[7]。既有的关于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理论阐述。吴兆春和林柳琳(2019)^[8]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理念,也是党对民营经济地位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解决了发展经济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重大理论问题。李拯(2018)^[9]强调,民营经济不是处于协助的附庸地位,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韩保江(2018)^[10]指出,我国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状况仍然没有变,要求有不同性质的多元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二是发展成就。高德步(2018)^[11]指出,民营经济在党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下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程建华和郭莹莹(2019)^[12]从企业数量、产值规模、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对外竞争、社会效益等方面阐述了民营企业发展成就。三是发展问题。宁吉喆(2018)^[13]指出,当前民营企业在开拓市场、转型升级等方面遇到一些困难。杨继生和黎娇龙(2018)^[14]指出,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在用工成本、税费负担、市场环境变化等方面面临不同的困难。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15]研究了在不确定性发展预期下,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之间的关系。四是对策研究。王一鸣(2018)^[16]认为,民营经济重点需要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上发力,保障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柳学信和张宇霖(2018)^[17]指出,要从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解决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陈东和邢霖(2019)^[18]指出,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来提高民营企业投资的规模和质量。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民营经济发展从多方面已经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但更偏重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而将民营经济放置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且规律性总结的不多。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1)新中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2)新中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3)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展望。

二、新中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70年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其中,改革开放前的30年可具体分为“恢复生产”、“社会改造”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具体可分为“改革发展”、“快速发展”、“科学发展”,以及党的十八大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

(一)恢复生产阶段(1949—1952年)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没收官僚资本,创建国营公司,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主导地位,保护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恢复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这涉及到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重建,以及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全社会的安宁。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改变落后的经济地位,中国必须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努力”(沈云锁、潘强恩,2011)^{[4]305}。但是,由于在接管过程中受到“左”的情绪影响,导致恢复生产工作存在曲折波动。当时拥有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工业城市天津,1949年1月解放后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黄孟复,2010)^{[2]9,10}。为此,刘少奇赶至天津与工商业者座谈,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这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表态性讲话,表明民营经济急需党的具体工商业政策定位和指引。随后,两个政策文件对稳定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是《共同纲领》。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施政纲领,第30条和31条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给以优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9]。其二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会议通过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宗旨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为了更好的贯彻与落实,政务院于1951年3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共10章105条,这一规定对当时存在的1万多家私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稳定和推动作用(黄孟复,2009)^{[20]13-16}。

毛泽东同志对私人资本的作用是肯定的。1950年春他指出:“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作还可以得到福利”(薄一波,1997)^[21]。在这一过程中,“三反”“五反”主要是打击城市私营经济中的不良不法行为,约有工商户总数的0.15%受到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90)^[22]。这是新政权必须的政治处置应对,并没有影响新中国构建的经济制度框架和民营经济实践发展。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恢复和发

展。1949—1952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户数由12.32万户增长到14.96万户,增长了21.4%;职工人数由164.38万人增长到205.66万人,增长了25.1%;总产值由68.26亿元增长到105.26亿元,增长了54.2%。另外,公私合营工业产值也从1949年的2.2亿元增长到13.7亿元,个体手工业则由32.7亿元增长到了70.6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93)^[23]。

(二)社会改造阶段(1953—1977年)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公私合营和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现“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城乡集体经济产生和艰难发展。

经过建国后三年的恢复与发展,1952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45倍,平均年增长34.8%,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比1936年增长了22.5%(汪海波,2017)^{[24]56}。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考虑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步伐,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准备用10至15年时间推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黄孟复,2009)^{[20]31}。应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虽然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过度追求速度而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总体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得到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配合。据统计,到1956年底,占私营工业总产值99.6%的企业和私营商业资本额93.3%的商店完成了所有制改造(邹东涛、欧阳日辉,2009)^{[25]116}。到1957年,在国民收入比重中,资本主义经济仅占0.1%(黄孟复,2010)^{[2]84}。不过,在私营经济融合进“一大二公”所有制的夹缝中,仍然保留了城乡极微量的个体经济和广义民营经济“形态”——面广量大的城乡集体经济,这和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及改制民营企业、次生型民营企业发展有着直接血缘关系。所以,党的理论家胡绳认为:“为什么中国能够在1978年后比较顺利地进行改革呢?这是因为改革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而已经有了前20年的经验的缘故”(胡绳,1998)^[26]。

城镇集体经济因为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当时城里有大量知识青年待业,迫切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停产闹革命”。这其中,街道集体经济是一支活跃的力量。街道企业被称为“小集体”,在隶属关系上,既不属于各级政府和主管部、局,也不属于二轻系统,因此具有内在的市场基因。1970年以后,一些国营厂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解决本单位子女和家属的就业问题纷纷办厂,进

一步壮大了“小集体”力量。据统计,按不变价格计算,1965—1976年,城镇集体工业产值由133.1亿元增加到489.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9.9%上升到15%(国家统计局,1984)^[27]。相对于城镇“小集体”经济,1957年人民公社化后诞生的农村社队工业经济更具有市场化基因。社队企业以农业为依托,在计划部门没有户头,在原材料和产品销售上均不被纳入计划管理,比城市“小集体”“待遇”更低。就是这样的特殊群体,享有比较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谋求生存和发展,孕育“四千四万精神”,接受市场机制的考验,有更强的生命力。据统计,1958年,我国社队工业产值为60多亿元,1963年下降到4.2亿元,随后开始有较大发展。1965—1976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社队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0.4%上升到3.8%;从业人员1769.8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6%(汪海波,2017)^{[24]256}。应该说,“小集体”和社队企业为改革开放培育了充分的市场基因。

(三) 改革发展阶段(1978—1991年)

这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底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在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后,个体经济率先获得快速发展并萌生私营经济,私营经济从无到有曲折发展。

由于计划经济模式偏重重工业发展的高积累而忽视生活资料生产,加之“文化大革命”对全面生产发展的破坏,以及长期以来“左”的思想阻遏,前三十年尽管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绩,但国民经济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1974年复出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先后召开解决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整顿发展经济。当年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邹东涛、欧阳日辉,2009)^{[25]238}。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迅即调整方针,于1978年派出四个考察组外出考察,并作出经济建设新决策。1978年11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张志勇,2019)^{[28]10}。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预示着个体私营经济的破

土生长和发展有了政策空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随后邓小平同志在“五老火锅宴”上希望工商界“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及对小岗村“包产到户”的认可并在全中国推广,其本质是从生产分配体制的调整上对调动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承认。党的政策在探索中充分体现了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时代特征,呼应民营经济实践并引领民营经济向前发展。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沈云锁、潘强恩,2011)^{[4]582}。1979年党的会议明确“个体劳动者”的定位,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当年年底的宪法修正案将个体经济写入宪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承认并允许私营经济发展,1988年私营经济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私营经济在法律上得到正式承认,并开始加速发展。

据统计,在1978年,中国城镇个体劳动力只有15万人(黄孟复,2010)^{[2]175},到1982年,个体工商户注册户数即升到263.7万户,注册资金8.25亿元,从业人员达到319.9万人。1991年底,注册户数增加到1416.8万户,注册资金488.15亿元,从业人员达2258万人。1988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4.06万户,从业人员72.4万人,注册资金总额32.86亿元。^①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10.8万户,从业人员183.9万人,注册资金为123.2亿元(全国工商联研究室,2010)^[29]。由于1988年底才有私营经济统计数据,在此之前的个体经济统计数据中包含有私营企业数据。据1987年国家行政管理局的摸底调查,全国约有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人数360.7万人。其中,以个体工商户名义存在的有11.5万户,雇工184.7万人;以合作经济组织名义存在的约有6万户,雇工96万人;以集体名义存在的有5万户,雇工80万人(庄聪生,2018)^{[30]102}。

(四) 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以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为标志到世纪之交,党和国家确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民营经济从少到多、由弱趋强,并进入快速国际化发展阶段。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于

1992年初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和“市场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争论的干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31]798}。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32],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理论上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31]811},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有机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确认。1996年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纲要》,把继续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今后十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坚持的方针,这是国家层面的施政目标。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更进一步确认。

在这一过程中,广大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升。1993年3月,23名民营企业家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了参政议政的舞台。截止到2002年11月,全国民营企业家中担任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共有9065名,担任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2025名(庄聪生,2018)^{[30]178}。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创业热情,第二代民营企业家开始崛起。1992年,大批体制内人员下海,辞职下海的有12万人,没辞职而投身商海的超过1000万人,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下海潮(张志勇,2019)^{[28]109}。民营科技企业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3万余名留学归国人员创办了民营科技企业,2000多名留学人员在全国50余家科技创业园创办企业(庄聪生,2018)^{[30]131}。民营经济还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进入一般性竞争领域,甚至涉足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陈东、杨平宇,2019)^[33]。在产权领域,许多民

营企业摘掉“红帽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快速发展。^②截止2002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2377.5万户,从业人员4742.9万人,注册资金3782.4亿元;私营企业243.5万户,从业人员3247.5万人,注册资金为24756.2亿元;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达1/3(黄孟复,2009;全国工商联研究室,2010)^{[20]252、[29]2、3}。

(五) 科学发展阶段(2002—2012年)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民营经济更加注重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上的地位,积极谋求转型升级、科学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逐步形成,民营经济更加注重竞争力的提升,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理论再次创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称为“两个毫不动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31]800}。同时,提出一个“统一”,即“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两个平等”思想,要求“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③同时,法律也及时予以跟进。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民营企业“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政治地位,同时把对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进行了明确。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该法案历时13年的修改,是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除了法律外,国务院出台了两项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文件。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3号文件,即《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包含7大措施36条(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政策性文件。2010年5月,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内容也包含36条(又称为新“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的政策文件。两个文件的出台,对民营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和消除市场投资壁垒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期间,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党和国家战略层面被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党的十六大上,首次有6位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出席大会。200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首次有4名民营企业家入围。2004年,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人事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举办的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活动,共有100位民营企业家受到表彰,该活动也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肯定(黄孟复,2010)^{[2]398,399}。在这一段时间,中国民营经济在科学道路上快速发展,截止2012年9月,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1059.8万户,注册资金29.8万亿元,从业人员和投资者超过1.1亿人;个体工商户总数3984.7万户,注册资金1.88万亿,从业人员8457.7万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14)^[34]。

(六)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民营经济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平等”思想,包括“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素平等使用被提高到战略高度。^④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会上提出了“两个都是”的重要论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强调“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⑤这些都体现了党和国家下决心破除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和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信心和魄力。大会还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此后,党和国家不断推进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法治化进程。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⑥

“两个不可侵犯”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广大民营企业安心、专心、用心谋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还第一次在党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上使用“民营企业”这个词,代替了“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传统的提法,表明党对民营企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政商关系是我国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关系,官商勾结和权利寻租等行为对社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清”两个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商关系朝着健康方向不断发展。企业家精神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内在动力因素,也是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界定了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提出了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但社会出现了“消灭私有制论”、“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各种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言论。在关键时候,党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再次表态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高度肯定了民营经济的作用,并以“自己人”来定位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稳定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习近平,2018)^[6]。在这一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产业集群和商会党的建设加快发展,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更好的政治发展交流平台(陈东、陈建军,2019)^[35]。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10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7137.2万户、私营企业3067.4万户,相较于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在允许登记后的1989年,分别增长了500多倍和338倍(林丽鹏,2018)^[36]。

三、新中国7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中国建立70年来,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发展实际和党的基本路线,对民营经济发展采取鼓励、支持、引导、服务的方针,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收获了宝贵历史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民营经济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党中央充分肯定民族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对民营经济加以团结、保护和鼓励,采取有力政策措施促使其恢复生产、放心生产,发挥民营经济在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公私合营,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为经济社会发展把方向、定政策、促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陈东等,2017)^[3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促进“两个健康”摆到重大经济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的战略高度,在不同场合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方针进行重申,以“亲”“清”关系内涵定位新型政商关系,以“内在要素”、“都是自己人”定位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这些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制度支撑和政治保障。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有力保障,新时代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引下,进一步改善完善各项政策措施,让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二)解放思想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民营经济伴随解放思想取得重大突破而发展壮大,无论是发展的动力,还是创新的动力,都来自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坚持根据具体发展阶段制定政策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创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保护和引导了民营经济融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道路上。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首先是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正确理解,不断解放和扬弃僵化的思想,对民营经济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深化,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发挥与市场作用发挥的关系上,形成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扫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20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时个体经济得到初始发展,八十年代“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引

领推动私营经济的创新发展,九十年代私营经济在国家政策放开后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并于新世纪我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得到较快发展,2003年之后民营经济开始加强转型升级谋求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大后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融入国家新的发展战略中。民营经济每次的发展推动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取得了改革发展的预期效果。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需要继续大力推动解放思想,形成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互为促进的良性发展局面。

(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认识到实践上的每一次新生事物的产生、突破和发展,以及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大胆实践和智慧。改革开放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发端,并快速扩展到城乡经济领域,在此过程中民营经济发展面对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对民营经济的定性、“戴红帽子”企业改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转型升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引导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次生型民营经济后来居上,共享经济“遍地开花”,还是互联网线上销售无处不在,淘宝村、电商村重塑农村商务模式,移动支付改变生活,惠龙易通、运满满等物流公司提高供应链效率,都来源于人民群众及企业家的伟大创造。中国民营经济原生型和次生型的共同发力发展,推动了全国上下深化对党的每一步理论创新的认识,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三期叠加”对我国的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经济在前进中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党和国家继续尊重和总结好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吸纳民营企业家的智慧和力量,更大程度上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创新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各级政府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是基本职责。营商环境对于打造吸引人才和投资高地,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着重要作用,是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当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体现在四个关键

性问题上: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没有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平等保护;尊重和激励民营企业的政商关系和社会氛围是否良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专业服务水平是否符合民营企业家的要求。中国不同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落差,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协调现象。究其原因,营商环境的优劣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实践证明,政府是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哪里市场取向改革相对不足,营商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哪里民营经济就难以得到充分发育,创业创新意识就淡薄,区域经济增长就乏力。营商环境的好坏是地方政府长期培育的结果,渗透在一个地方整体文化氛围之中。全国上下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以改革创新的办法,以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标准,对症下药革除各种影响营商环境的弊端,让亲商、安商、富商观念在全国上下蔚然成风,让广大民营企业安心、专心、放心、舒心谋发展,进一步优化区域和各地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更高质量、更加均衡的发展。

(五)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企业家精神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为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民营企业家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者,改革开放的重要接力者,他们的成功经验为改革开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一些存在的不足也为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镜鉴。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民营企业家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有立场,永远与党同心同向同行,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充满信心;有思想,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党和国家的各项改革开放举措,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会不断完善,坚信中国经济有广阔前景,对民营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加强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研究;有情怀,积极担负起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展现出新的格局和担当,积极投入光彩事业、精准扶贫和公益慈善事业;有坚守,讲正气,走正道,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有匠心,专注品质,追求极致,实现企业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吴跃农,2013)^[38]。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突出业绩,离不开广大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新时代要进一步营造企业

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让企业家精神引领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新时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按《人民日报》社论定义,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王永昌、尹江燕,2018)^[39]。进入新时代,民营企业在践行五大发展理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正在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一)积极推动创新发展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企业若不能及时转型创新,对接市场大趋势,将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中国民营企业虽然说底子薄、资源少,但具有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经营高效等特点,具有巨大的创新动力。民营企业不断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自身积累的增加,大量民营企业相继提出“二次创业”目标,核心内容就是“创办实业”,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据统计,1997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为6.5万家,固定从业人员315.5万人,上缴税金265.6亿元,较1993年分别增长了2.5倍、3.2倍、7.1倍。1997年,民营科技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达2163亿元,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5.0%,有的企业达到10%,远高于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1.2%的水平。在企业固定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占30%以上,有的高达50%(王亚平,1999)^[40]。进入新世纪,民营企业进一步投身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金融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领域。2017年11月,科技部公布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全部为民营企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攻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难关,在创新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已占全国总量的65%,专利发明占75%,新产品80%来自民营企业(高云龙、徐乐江,2018)^[41]^[39]。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主力军,

2019民营企业500强调查显示,拥有研发人员的企业有409家,其中,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3%的企业有328家。至少有5家企业的年度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华为的年度研发费用为1015亿元,吸纳海外超过1.5万名科学家。吉利投入210亿元加大研发力度,并将研究机构布局到德国等西方国家。百度研发费用达157.72亿元,汇聚了一批AI领域世界顶级专家。^①

(二)积极推动协调发展

伴随着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降低产业、区域、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内容。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的企业群体,是化解各类结构不协调矛盾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受各种隐形投资门槛限制,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产业层次较低,这也是制约全国整体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在“非公经济36条”出台前,全国工商联2014年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行业数量前10位的几乎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达68.62%,而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的产业层次更低。2014年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样本中,仅商业餐饮比重就达到24%(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07)^{[42]166,320-32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逐步拓展,产业结构明显升级。数据显示,在新登记的民营企业中,商业商务服务和科学研究服务占比进入前三(高云龙、徐乐江,2019)^[43]。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相比较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20.77%。第二产业虽然占比下降7.42%,但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大幅上升,行业结构持续优化。^②在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上,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截止到2012年底,民营企业先后参与“老少边穷”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开发、三峡库区移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行动,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7727个,到位资金近5035.75亿元,培训人员784.39万人,安排就业993.18万人,帮助带动1880.48万人脱贫(庄聪生,2018)^{[30]19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开展精准扶贫的总体部署下,全国工商联等发起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截止2019年6月底,进入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已达8.81万家,精准帮扶10.27万个村,产业投入753.71亿元,公益投入139.1亿元,安置就业66.15万人,技能培训94.1万

人,共带动和惠及116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谢卫群、方敏,2019)^[44]。民营企业还是城镇化的重要推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0.64%增长到17.92%,增速缓慢。改革开放后,由于有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提供城镇就业岗位,城镇化率持续快速提高,到2018年提升到59.58%。^③

(三)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民营企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加快生产设备升级、提高环保节能效率、调整自身能源使用结构、提高清洁能源占比、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污染落后产能等方式,贯彻落实国家绿色环保战略,实施清洁生产,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在落实国家环保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46.65%的企业转产高端产品,13.4%的企业通过试制新品来减轻对环境污染。从纵向趋势来看,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均值)呈稳定上升的态势,治污投入从2006年的13.62万元上升到2016年的40.21万元,环保治污费从2012年的8.07万元急速上升至2014年的39.36万元(王钦敏,2017)^[45]。上规模民营企业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力军。2019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有76.40%加强污染防治,较上年增幅为12.02%。^④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注重自身绿色环保生产、减少环境负外部性的同时,还致力于水土流失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土绿化、沙漠治理等生态保护治理与修复活动。以参加“国土绿化”行动为例,非公有制林业企业目前已占全国林业企业总数的70%以上,非公有制林业经济总量占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的68%以上。在全国造林面积中,非公有制企业未完成面积占60%以上(王满,2014)^[46],出现了民营企业王文亿领导的亿利集团数十年在库布其沙漠坚持再造绿洲的先进典型。民营企业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生态环境部和全国工商联的高度肯定和重视。2019年1月,两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营造企业环境守法氛围、健全市场准入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标准、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加快“放管服”改革、强化科技支撑服务、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等18项重点举措,这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平台。^⑤

(四)积极推动开放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

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2017)^[47]。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发挥经营机制灵活、适应环境能力强的优势,主动走出国门,实施“走出去”战略,到更大的国际市场上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逐渐成为我国“走出去”的生力军。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参与对外开放的过程。1995年,国家首次赋予10家民营企业外贸经营权,此后民营企业迅速占据主角,到2007年,具有外贸经营资格和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已有30多万家,占全部内资企业的90%以上(黄孟复,2008)^[48]。在参与实施“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民营企业还积极加强对外投资,特别是抓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性机遇,主动出去,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境外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合作取得新进展,呈现集群式、多元化、规模型发展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机遇和发展空间,围绕总体布局,聚集主业,聚集实体经济,重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工业园区和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撑等优先项目上开展合作,并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有能力、有国际化视野的企业。据统计,2018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12.2万亿元,增长12.9%,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0%,对年度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①对外投资呈现更加积极的姿态,占对外投资存量的比重已经过半,并购逐渐转向规模大、涉及高端技术与品牌的项目。截止2018年末,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13亿美元,其中民营经济控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755.7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3%,较上年提升13.6%。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数据显示,2017年,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全部总量达43%。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达4325.4亿美元,占全部总量达55.9%(高云龙、徐乐江,2018)^{[41]18}。

(五)积极推动共享发展

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许多民营

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争当履行社会责任的引领者,既注重公益慈善的“输血”功能,也重视产业扶贫的“造血工程”,为社会共享发展贡献重要力量,是共同富裕的构建者。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创造就业机会,助力改善民生,是民营企业推行共享发展的主要渠道,也是推动“人口负担”向“人口红利”转变的“法宝”。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经济就是为了解决就业应运而生的。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5.4%。因为当时公有制企业没有这么大的安置能力,需要打破原有的劳动就业体制,拓宽就业渠道,发展多种就业形式。198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问题的通知》指出:“必须全面改革现行的劳动制度……拓宽就业渠道。”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随后下发了《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黄孟复,2009)^{[20]154,155}。可以说,民营经济最初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就是解决就业。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又在解决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中起到关键作用。据统计,1995-2003年,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从11.8万个下降至3.42万个,就业人数从1.126亿下降到0.688亿(陈秋霖等,2017)^[49],这些下岗人员主要靠分流到民营企业再就业。近年来,党中央把“稳就业”作为“六稳”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民营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据统计,目前民营企业为城镇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高云龙、徐乐江,2018)^{[41]21}。可以说,只要是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收入差距和就业压力就越小,人口红利就越彰显。在公益慈善事业上,广大民营企业也积极踊跃参与。最近几届的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大额捐款的主力军。2018年,中国大陆来自企业的捐赠共计890.84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捐赠约450.32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量的50.55%,高居企业捐赠的首位。

注释:

① 1988年,山西、黑龙江、西藏尚未开展私营企业登记工作,因此当年数据未包含上述三个地区。

② “红帽子”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采取的做法。具体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挂靠型,挂在某一集体企业或单位名下,实质仍然是个体私营经营;二是出租转让营业执照型,主管部门办好集体营业执照,然后将经营执照出

租或发包给个人经营;三是“假合作型”,在政府推动下,以“合作制”等名义,按集体企业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但实质仍是私营企业,不按集体企业制度进行管理,不需要提取公共积累。

- ③ <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 ④ <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html>
- ⑤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01-23560979.html>
- 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29/c1001-25926893.html>
- ⑦ http://www.acfic.org.cn/zzjg_327/nsjg/jjb/jjbgzhdzt/2019my5bq/
- ⑧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8_1674587.html
- ⑨ <http://env.people.com.cn/n1/2019/0220/c1010-30807251.html>
- ⑩ http://www.gov.cn/xinwen/2019-05/25/content_5394622.html
- ⑪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909/20190902899692.shtml>
- ⑫ http://www.stats.gov.cn/tjcz/ztfx/ggkf40n/201809/t20180912_1622409.html
- ⑬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5270902044195567&wfr=spider&for=pc>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 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5] 胡迟.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展[N].光明日报,2018-2-07:C11.
- [6]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2:C2.
- [7] 卫兴华,谭璇.2018年理论经济学若干热点问题研究及讨论综述[J].经济纵横,2019(1):118-128.
- [8] 吴兆春,林柳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营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演进及现实启示[J].岭南学刊,2019(6):11-18.
- [9] 李拯.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8-9-14:C5.
- [10] 韩保江.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N].光明日报,2018-11-7:C13.
- [11] 高德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J].行政管理改革,2018(9):40-47.
- [12] 程建华,郭莹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成就及经验启示[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36-41.
- [13] 宁吉喆.大力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J].人民论坛,2018(36):6-8.
- [14] 杨继生,黎娇龙.制约民营制造企业的关键因素:用工成本还是宏观税负[J].经济研究,2018(5):103-117.
- [15] 于文超,梁平汉.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9(11):136-154.
- [16] 王一鸣.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N].光明日报,2018-11-13:C11.
- [17] 柳学信,张宇霖.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N].人民日报,2018-11-14:C7.
- [18] 陈东,邢霖.政府补贴会提升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质量吗——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比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8):84-99.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7-8.
- [20] 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16.
-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1-102.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1949-1952)[M].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501-502.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1949-195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29-732.
- [24]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 [25] 邹东涛,欧阳日辉.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1949-200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5.
- [2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13-215.
- [28] 张志勇.民营企业40年[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10.

- [29]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1-5.
- [30] 庄聪生.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102.
- [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798.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26-527.
- [33] 陈 东,杨平宇.新时代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31(5):25-35.
- [34]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年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0.
- [35] 陈 东,陈建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与党建工作创新[J].国家治理,2019(16):3-8.
- [36] 林丽鹂.改革开放40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增长500多倍[N].人民日报,2018-12-9:C1.
- [37] 陈 东,洪功翔,汪 敏.党组织建设与民营企业投资——基于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江苏样本的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7(10):7-14.
- [38] 吴跃农.论“统战性”是工商联的重要属性[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12):27-32.
- [39] 王永昌,尹江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18-10-12:C7.
- [40] 王亚平.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状况及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1999(B1):10-25.
- [41] 高云龙,徐乐江.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9.
- [42]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320-325.
- [43] 高云龙,徐乐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17-2018)[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9:3-4.
- [44] 谢卫群,方 敏.“万企帮万村”惠及近千万贫困人口[N].人民日报,2019-10-25:C7.
- [45] 王钦敏.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15-1016)[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109-111.
- [46] 王 满.绿色产业打造生态文明新局面[J].中国林业产业,2014(11):24-29.
- [4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8-199.
- [48] 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7-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2.
- [49] 陈秋霖,胡钰曦,傅虹桥.群体性失业对健康的短期与长期影响——来自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下岗潮的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7(5):51-62.

[责任编辑:冯 霞]